

在疏離甚或抵制，也許另有一條線索在慢慢靠攏新式媒介。如果為了解釋歷史突變的便利，而將1895年的重大事件作為一個截然的分水嶺，可能會遮蔽了歷史內在的混雜性，而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近些年史學界一直在反思的「衝擊—回應」模式。假設作者這樣一種解釋有其科學性，那麼按照作者的邏輯，對

於晚清新式傳播媒介在1900年後的轉向，即從專注政治改革的上層路線轉向到以啟蒙中下層社會為主要目的，該如何解釋？如果前面的衝擊—回應模式是成立的話，那麼這個時間似乎應該倒推到1898年百日維新的挫敗。因此，這種以重大事件來解釋歷史的突變的方式，也許值得進一步討論。

探索走出中日關係困境的一個方案

● 陳奉林

周永生《通向中日和解共榮的道路》一書指出，90年代以來，兩國圍繞着歷史、釣魚島、靖國神社等問題頻繁發生矛盾對立，特別是2001年上台的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中國的抗議，連續四年參拜靖國神社，導致了兩國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和冷卻化。這正是中日關係的癥結所在。



周永生著，鄭青榮譯：《日中和解・共榮への道——關係改善への戰略的提言》（東京：日本僑報社，2005）。

周永生是國內中日關係研究隊伍中活躍的青年學者，近年出版了一部深有影響的著作《經濟外交》。最近又出版《通向中日和解共榮的道路——對改善關係的戰略建議》（《日中和解・共榮への道——關係改善への戰略的提言》，下稱《道路》，凡引此書，只註頁碼）。這部著作出版後立即引起國內外讀者的關注。這是作者對近年中日關係屢陷困境的深入思考，無論在內容、分析模式還是在探尋解決困境的出路上，都給人以厚重清新的感覺，視其為破解目前中日關係困境、推進中日關係進程的著作並非虛飾。

《道路》由三部分組成。可以說，作者是在中日關係進退轉換的里程碑上舉出其大筋大節，解析外

在的情況，指點內在的癥結，在思考中探尋走出中日關係困境之道，推進裹足不前的兩國關係。在第一部分「『政冷經熱』狀態下的中日關係」中，作者首先從多方面尋找了造成目前中日關係困境的原因，並注意到一果多因。作者指出，90年代以來，兩國圍繞着歷史、釣魚島、靖國神社等問題頻繁發生矛盾對立，特別是2001年上台的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中國的抗議，連續四年參拜靖國神社，結果導致了兩國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和冷卻化。這正是中日關係的癥結所在。其次，作者考察了日本爭取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問題。作者不贊成日本的入常態度，認為日本沒有徹底清算給亞洲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歷史，在這種情況下入常是不會得到亞洲各國的支持，也不會取得成功的。日本的「爭常」活動完全是出於日本一國之私利，根本沒有考慮亞洲其他國家的感受。在該書中可以看到，日本因「爭常」而引發的亞洲各國的抗議如潮，「不僅韓國和中國民眾掀起大規模的對日抗議行動，而且影響廣泛。」(頁35)中日關係曲折發展，複雜的歷史因緣屢屢昭示於前。

《道路》在昭示兩國關係時，沒有忽略歷史問題對中日兩國關係影響的探究。該書認為，歷史問題是制約中日關係進一步發展的「瓶頸」，尤其是日本文部省審定的歷史教科書中美化侵略、支配亞洲的意識，嚴重地傷害了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人民的民族感情。作者尋找造成目前中日關係困境的原因，十分重視深入揭批日本教科書中的錯誤，通

過列舉日本在華進行的集體屠殺、勞工的悲慘結局、人體試驗等情況，具體批判教科書中的右翼觀點，讓讀者看到了對外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中的真實的日本，他指出：

「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」修訂的《新編歷史教科書》，比四年前送審的歷史教科更為歪曲歷史、美化侵略，充滿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皇國史觀、支配亞洲的意識以及對他國的優越感。同時隱瞞加害事實，渲染受害者意識，大肆宣揚侵略有理，侵略有功，使用「大東亞戰爭」的說法，肯定日本發動戰爭是自存自衛的目的，歌頌日本國民積極投身戰爭的獻身精神。這些都是對侵略戰爭缺乏基本正確認識的表現。(頁56-57)

這是作者在看到日本對亞洲人民的感情傷害後得出的必然結論。

中日兩國領土與海洋劃界問題也是該書着力探索的一個重要方面。該書大膽提出以「東中間線」劃界解決中日東海爭執的觀點。這是廣大讀者頗感興趣的問題。該書提出的「東中間線」決不意味着將中國領土拱手讓人。「東中間線」的基本內涵是：中日雙方通過談判各讓一步，根據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，從中日兩國領海基線計算，在東海先劃一條實際的中間線，這條中間線比日本主張的「中間線」要偏東，因為排除了日本以釣魚島為領海基線的不合理基線劃法。然後，以此中間線為西部起點線，以中國主張的沖繩海槽分界線為東部起點線，在兩者之間再劃出一條中間線——即「東中間線」作為中日之間東海劃界

《道路》一書提出，在東海先劃一條實際的中間線，這條中間線比日本主張的「中間線」要偏東，因為排除了日本以釣魚島為領海基線的不合理基線劃法。然後，以此中間線為西部起點線，以中國主張的沖繩海槽分界線為東部起點線，在兩者之間再劃出一條中間線——即「東中間線」作為中日之間東海劃界的分界線。這樣中日互有所讓，互有所取，是解決東海劃界爭執比較公平、現實、合理的辦法。

的分界線。這等於中日雙方互有讓出，互有所取，是解決東海劃界爭執比較公平、現實、合理的辦法（頁84-85）。通過研讀，我們看到作者對此問題的深入、平實之論。且不論這個觀點是否妥當，也不論其能否為中日雙方所接受，但是作者勇於走出書齋帶着強烈的使命感去研究問題，提出獨立見解，是值得稱道的。像這樣帶有極大風險性、啟發性與前囑性的問題，顯然是當前中日關係研究中極為重要的焦點，充分顯示了作者並未視學術研究為畏途的探索精神。

第二部分「關於中日關係惡化原因與戰略視角」，是本書的重點所在。作者從多方面探尋中日關係緊張的癥結所在，把它看成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，其中小泉首相及日本政府審定通過美化侵略的歷史教科書、參拜靖國神社等政策是主要因素。與此相聯繫，該書還詳細考察了兩國的政策因素、國情因素、互動因素以及國際因素。在探尋造成中日關係困境的諸多原因時，作者並沒有忽略對中國政策缺陷的反思，「中國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長期的敲打政策，造成日本的逆反心理。」「對日本否定、美化侵略歷史的做法，保持一定政治壓力是必要的，但若僅僅如此卻遠遠不夠。」實際上該書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：

如果我們能夠拿出猶太人在世界範圍內系統考證、研究、揭露和宣傳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歷史真相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，細緻入微的考證與說理，和風細雨的滲透與揭

露，讓日本民眾了解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殘暴和血腥統治狀況，現在中國民眾大規模反對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立場與活動，就能夠得到世界上各國大多數民眾、包括相當一部分日本民眾在內的理解，中方在該問題上的外交工作也不會陷於被動。（頁117）

該書提出的問題，對我們拿出更多、更有力的歷史鐵證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是十分有益的。

《道路》從東亞和平與發展的長遠觀點出發，提出破解中日現實關係困境的重要考慮。作者看到今天的中日關係不同於70年代初兩國建交之時，斗轉星移，時過境遷，今天兩國的關係遠比過去複雜和嚴峻得多。這是兩國走向大國進程中的深層次問題，既是不可避免的，也無須大驚小怪。因為在這一時期，無論中國還是日本，都處在走向世界級強國、大國的過程之中，各種利益相互重疊交叉甚至矛盾衝突，因此對中日關係應給予足夠的關注。該書與眾不同之處在於，是在痛定思痛中反思過去的歷史，繼而為推進中日關係進程指出新的路徑與方法，因而從根本上提出改善中日關係的設想。作者不贊成過去喜歡實行的大兵團、大批判式的簡單做法，「中國方面僅僅重視那種在歷史問題上表面的、高壓的、簡單的做法，不僅於事無補，反而容易激起日本國民的心理反彈和厭惡情緒。關鍵的關鍵是促使日本國民了解歷史真相，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。」（頁149）作者看到的問題，正是我國對日政策中的薄弱環節，我

《道路》從根本上提出改善中日關係的設想。作者不贊成過去喜歡實行的大兵團、大批判式的簡單做法，「中國方面僅僅重視那種在歷史問題上表面的、高壓的、簡單的做法，不僅於事無補，反而容易激起日本國民的心理反彈和厭惡情緒。關鍵的關鍵是促使日本國民了解歷史真相，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。」

們必須予以高度重視。該書清晰提出對日政策的新思路，對於思考今天的外交不無啟發意義。

《道路》涉及的內容廣泛，試圖從眾多問題當中選擇幾個加以突破。它注意到中日韓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作用，看到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大國制衡。在經濟對策上，中國應加強與韓國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談判，在東亞地區採取以東亞國家為主，並不排斥其他國家加入的開放政策；「在政治問題上，中國一動不如一靜，保持現有的對日政策，構成對小泉政府的政治壓力和威懾作用。」(頁157) 正因為如此，該書從歷史到現實，從政治經濟到軍事外交政策的分析，頗具合理性和可行性，並能引起讀者的思考。該書不僅從理論上提出對日政策的總體思考，更為重要的是拓展了研究中日關係的視野，使學術探討更為理性成熟。俄國著名思想家普列漢諾夫(Georgy V. Plekhanov)在《俄國社會思想史》(*History of Russian Social Thought*)中說：「歷史家不應該哭，不應該笑，而應求得深解。」《道路》即是一部「求得深解」的著作，響亮地提出對改善中日關係的若干大膽建議。

第三部分「對中日關係的前景展望」，對中日關係的發展趨勢作了充分的估計。該書從近期、中期和長期對中日關係作了深入分析，其審度是相當謹慎而求實的。該書把四個問題作為決定近期中日關係的因素。一是經濟因素。由於全球化發展使各國聯為一體，相互依存進一步提高，因此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不會走得太遠。二是小泉因

素。該書判斷，在小泉任期內中日關係不會有大的起色。三是中日民間交流因素。作者看到民間力量對推進與改善中日關係的作用。四是東亞共同體建設因素。作者肯定中日兩國在建設東亞共同體中的大國作用，東亞共同體建設得好，將有助於改善中日關係。從長遠觀點來看，該書對中日關係持樂觀態度：「從長期的中日關係來看，前景必定是光明樂觀的。這是由世界和平發展的大趨勢及中日兩國在東亞的地緣態勢決定的。」(頁161) 在本部分中，作者提出許多新觀點，如認識日本文化的獨特性、重視對日本的文化外交、推進民間外交活動等等。該書從對問題的總體把握，到一系列具體問題的深入展開，從對問題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獨到看法，到中日關係總問題的定性分析，都表現出新意。可以看出，《道路》在研究這些問題時採取了上下探索、左右考察的方法，做到了系統把握而不是書齋裏的主觀推斷，表現出對問題理解與判斷的成熟。

當然，這部著作也有它的不足甚至缺陷，突出地表現為對日本走向大國的必然性的分析略顯不足，對分析與論述的關係存在畸重畸輕的情況。目前，中日關係出現的問題正是兩國走向大國進程中的問題，具有不可避免性的特點。總之，筆者認為《道路》是一部以推進中日關係為己任的著作，具有很強的現實責任感、政策意義與學術價值。尤其是書中大視野、大魄力的分析方法，在當前中日關係正處於轉捩點時候，需要的正是大智大勇，需要的正是智慧與理論的成熟。

《道路》一書列出四個決定近期中日關係的因素。一是經濟因素。由於全球化使各國聯為一體，因此中日關係不會走得太遠。二是小泉因素。該書判斷，在小泉任期內中日關係不會有大的起色。三是民間交流因素。作者看到民間力量對改善中日關係的作用。四是東亞共同體建設因素。作者肯定中日兩國在建設東亞共同體中的大國作用，東亞共同體建設得好，將有助於改善中日關係。